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Henry Kissinger, a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suit and tie, holding a newspaper. The newspaper has several headlines visible, including "KISSINGER IS ASKING WHY JUSTICE SYSTEM FAILS", "Thousands in", and a large section titled "TRUMAN" with several circular images.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surface.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吴继淦 张维 李朝增 译

Kissinger

Vol.
2

**WHITE
HOUSE
YEARS**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目录

第三部分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从混乱到希望

- | | | |
|-----|------|----------------------------|
| 543 | 第十二章 | 战争扩大了 |
| 650 | 第十三章 | 苏联之谜：欧洲、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最高级会谈 |
| 695 | 第十四章 | 一九七〇年的中东 |
| 741 | 第十五章 | 多事之秋：约旦 |
| 789 | 第十六章 | 多事之秋：苏联在西恩富戈斯的潜艇基地 |
| 816 | 第十七章 | 多事之秋：智利 |
| 856 | 第十八章 | 应邀赴北京 |

第三部分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从混乱到希望

第十二章 战争扩大了

印度支那一九七〇年的动乱和传言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老挝和柬埔寨都卷进了战争漩涡。一九七〇年初，上台还不算太久的美国政府的最大愿望莫过于使战争降级。然而北越一方面同我们进行秘密和谈，一方面使军队的行动同美国舆论巧妙地配合起来，故意搞了个战争升级。这年二月，北越在老挝查尔平原发动了攻势。三月，他们开始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被他们完全非法占领的、位于柬埔寨同南越接壤地区的庇护所出击，切断交通，骚扰金边，企图推翻在我们既不了解也未参与的情况下取代了西哈努克政府的朗诺政府（联合国和苏联都承认朗诺）。

可是，由于接踵而至的悲剧而受到愤怒谴责的并不是河内，而是美国。当我在巴黎同北越使者黎德寿谈判时，他拒绝使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化，强调他的人民命中注定不仅要接管南越，而且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牛皮是私底下吹的，但表现这种狼子野心的军事行动是有目共睹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柬埔寨的噩梦是美国决策引起的。这是一种顽固的民族变态心理的产物。现在，越南人已经在没有美国挑衅作为借口、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抗议声的情况下终于实现了他们征服整个印度支那的野心，然而这种论调还在流传。在柬埔寨，一伙杀人不眨眼的理论家结成的乌合之众看来确实已为一个有组织的共产党国家取而代之，但完成此事的正是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开始试图这么干的外来武装力量。柬埔寨苦难的根源是河内贪得无厌地谋求霸权，而不是美国优柔寡断的反应。

我们的军事反应引起了大量痛苦的呻吟，而我们则认为要使我们的撤退不至成为溃败，这些反应是最起码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所谓美国官员在柬埔寨阴谋推翻中立的西哈努克亲王、更深地投入到老挝和柬埔寨战争中去说法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正说明感情胜过了现实。四月三十日宣布我们对柬埔寨庇护所发动进攻的理查德·尼克松，正是四月二十日宣布撤走十五万军队的同一个总统。最后终于采取行动阻止共产党完全接管柬埔寨的美国政府，正是四月四日提出柬埔寨中立化建议——并遭到轻蔑拒绝——的同一个政府。关于印度支那，存在大量令人痛苦的怪事。顽固拒绝和解的是河内，受谴责的却是美国，这几乎使美国政府不知所措。这些大事相互联系，都需要在本章分别加以叙述，但开始必须谈谈当时政府的实际状况：一九六九年底和一九七〇年初，我们了解越南当地情况——并再次同河内进行秘密和谈——正进行重大努力。

研究工作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就开始了。那时，埃利奥特·理查森和我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即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五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单说明了这个小组的目的。我说：

回顾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们多么频繁地被他们关于越南的成见引入歧途——尽管对唾手可得的事实做一点细致客观的分析就会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个小组十月二十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埃利奥特·理查森、戴夫·帕卡德、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的代表。我的工作人拉里·林恩和鲍勃·桑塞姆领导的一个工作组对南越四十四个省当中的十二个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解决准确地估计农村形势——即为控制农村人口而斗争的形势——这个多年存在的难题。

我读了长达一百页的研究报告，在上面注满了问题。例如：为什么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给我介绍的情况是南越人正在取得进展？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顾问们了解他们看到的情况吗？我写道：“我发现最不称职的人正是最容易感到满足的人……如果你那儿事件较少，这究竟意味着你干得漂亮还是敌人故意如此呢？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是否是一个信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摧毁的是什么样的常设基地？……大家都说土地改革很重要。可是土改还没有进行，我们的绥靖工作却取得了进展。这怎么可能呢？”重新起草的文件回答了这些问题。于是我在一月二十二日把文件的结论摘要报告了总统。南越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相当可靠地处在政府的管辖和保护下（特别是一九六八年春节攻势的失败使越共损失大量干部之后）。但是敌人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二的农村居民，从农村包围城市，使城市“像熟透了的果实般掉下来”。这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九六八年九月以来，西贡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从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共产党的控制则从百分之三十五减少到百分之七。约四百万南越农村居民生活在双方争夺地区，白天受西贡控制，夜晚受越共控制。但是，我们在继续撤军的情况下，对能否保持这个比例是没有把握的。

统计到的数字比较令人鼓舞，然而我们也知道北越并没有丧失信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河内发表了其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写的一系列文章，共计七篇，其主要论点是：通过持久斗争可以战胜美国的技术优势。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送呈总统的文章提要中预言，河内将拖延时间，直到美军撤出的数量使它可以在比较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向西贡武装力量提出挑战。一月中旬，我把自己对一些态度乐观的报告的怀疑归纳如下：

（一）北越人战斗了二十五个年头，不可能不再作一次重大努力而

就此罢休。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对美军、越南共和国部队*或地方部队发动攻击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他们决定不作这种努力，照说他们应当对于谈判更积极些。（总统在这里批注：“有道理。”）

（二）我们还没有见到说明越南共和国部队真正有所改进的证据。可能的情况是敌军受到了创伤，而不是越南共和国部队比过去大有进步。还有一种可能是：也许由于我们八月初在巴黎提出的威胁，敌人主力后撤了，减少了八、九两个月的活动，而低估了这种做法对他们游击部队的影响。

（三）也许上级要求乐观报道的压力太大……

由于这些原因，我建议总统把我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和一个分析专家小组派往南越访问。他们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九日调查了九个关键省份，证实了我们在华盛顿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们也警告说：形势好转的速度在一九六九年最后几个月已经明显地放慢了。

“没有迹象说明敌人已经认输……美军撤退给越南政府**造成的压力可能导致……地方保安部队工作的恶化，使越南政府丧失民众支持。”中央情报局独立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表明南越领导人由于害怕美国过分仓促撤走，悲观情绪日益加剧。我把中央情报局这份报告送给了尼克松。他在报告上写道：“基***——心理状态极为重要。他们必须挑起担子，才有可能建立信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冒点风险。”

诚然，当时也有相反的观点。以打败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设计者著称的英国游击战问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问了越南。后来他报告说，西贡处于“取胜的地位”，而且除非美国

* 即南越部队。

** 即南越政府。

*** 指基辛格。——译注

撤走过快并减少援助，西贡将可保持这种地位。各部门都得到了这份报告，并且——同他们在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里表达的观点多少有点矛盾——对报告表示赞同。

但无论进行多少研究，无论这些研究多么客观或恳切，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基本矛盾。对于决心持久作战的敌人，必须使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才可能使他们走向妥协。我们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加强南越的力量，挫败河内在这方面的一切阻挠。我们的战略肯定会遭到美国人当中那些虔诚的、大声疾呼的、人数日增的少数派拼命反对。十一月三日的演说为越南化赢得了一定时间。可是时间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加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同时，我决心探测一下谈判的前景——通过谈判，双方可以检验自己对于对方的估价，而我们则力图从似乎无解的僵局中找出解决办法。

回到秘密谈判

我一贯认为举行谈判最有利的时机是局势发展看来顺利的时候。向压力屈服等于鼓励对方施加压力；给自己造成一个缺乏毅力的名声等于大力鼓励对方拖延谈判。主动让步是促使对方也让步的最有力的办法，也是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好保证。在我参与过的谈判中，我总是设法判断什么是最合理的结局，然后努力用一两步就迅速达到目的。那些喜欢零敲碎打、到最后一分钟才举步的人嘲笑这种战略是“先发制人式让步”。但是我认为他们那种战略的主要作用不过是安抚官僚机构，并使良心得到慰藉。初出茅庐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强硬的表现。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战略总是弄巧成拙；零敲碎打地吊胃口会促使对方坚持不让，等着瞧下次可能出现什么让步，总也不能断定这是否真正的底牌。因此，在我同越南人以及其他人的多次谈判中，我倾向于在出乎意料、压力最小的情况下采取重大步骤，并使对方认为我们将坚守这一立

场。我几乎一贯反对在压力下修改谈判立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似乎是尼克松政府就职以来我们的地位最强有力的时候。我们顶住了河内发动的一次军事攻势，也顶住了反战大示威；总统向人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大量支持。这个月，亨利·卡伯特·洛奇由于个人原因辞去了出席巴黎谈判的大使职务，而尼克松为了对谈判进展缓慢表示不快，拒绝提出继任人选。河内把这看作是我们可能恢复轰炸的信号，因为停止轰炸是以开始谈判为条件的。它顽固阻挠巴黎谈判达一年之久，现在却不断叫嚷要美国任命新的高级谈判代表。我建议尼克松利用这段时间再试试是否可能举行秘密谈判。北越无法利用巴黎秘密渠道进行宣传；如果他们拒绝谈判，公布出去对他们是不利的；如果河内准备解决问题——这一点我是怀疑的——我们也只有通过秘密谈判才能获悉。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只要我们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就可以立此存照，证明河内是谈判的阻力。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尼克松对谈判持怀疑态度。他不大相信河内在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之前会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任何条件解决问题。这种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总的说来，任何谈判过程都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他非常不喜欢使自己处在可能失败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小心翼翼为失败安排借口。我每次参加谈判之前，尼克松都要通过书面或口头下达要我保持强硬态度的命令，并以某种方式表示他并不真以为谈判会成功。但是，因为尼克松尽管说话很硬，实际上却真诚希望和平，所以他最后总是不得不同意我的论点，即我们对人民负有责任，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必须探索光荣解决的可能性，并且记录在案，说明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于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我们请我国驻巴黎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提出同春水秘密会晤的要求；他们迅即接受了要求。这是尼克松当政时期我们第一次不通过外国中间人直接同北越人接触。沃尔特斯建议他们同我再次秘密会晤。但北越人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作为周密的计

划者，他们对尼克松十一月三日演说的全部含意还没有得出结论。或许由于春水不是决策人，他们认为在这一级再次会晤没有意义。河内感觉必须首先表示冷淡，以便恢复心理平衡。

不管是什么理由吧，十二月十二日，沃尔特斯将军被召请到北越人的驻地。北越驻巴黎总代表梅文蒲宣称河内对十一月三日的“好战”演说、对总统拒绝任命一位高级官员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不快。他要我们注意河内在八月会议上提出的、他称为“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议。既然我们过去已经拒绝这个“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议，河内认为举行新的秘密会晤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我们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谈。

在遭到河内拒绝整整一个月之后，我又做了巨大努力，说服尼克松授权再做一次尝试。于是，沃尔特斯将军在一月十四日会见了春水，建议在二月八日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举行会晤，“如果双方都愿意摆脱现状的话”。尼克松仍持怀疑态度。“我不知道这些小丑要谈些什么玩意儿，”他对我说，“但我们的方针是：如果他们不谈，我们就沉默到底。我并不认为现在是做出让步的时机。”

河内一连几个星期毫无反应。但是，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看到了谈判可能即将开始的第一个迹象。河内宣布，北越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统治集团中第五号人物）、河内同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判的主要代表黎德寿将参加即将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然后，二月十六日，北越人把沃尔特斯召到他们驻地，通知他说，我们傲慢的谈判对手同意在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举行会晤。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现在却要求我们在十二小时内答复。后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限期内接受了二月二十一日作为会晤日期。现在回想起来，我毫不怀疑，当时遵从这种蛮不讲理的要求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印象，而这是不必要的；它使河内在心理上赢得了它极为珍贵的一分。这件事并未造成长期损失，但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别扭。

黎德寿和我的秘密谈判就是这样开始的。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 到四月四日，共开了三次会。

精力充沛的沃尔特斯真是得其所哉。他给谁担任翻译就喜欢模仿谁。如果说有什么事比这更使他得意的话，那就是安排秘密会晤。为了进行得更秘密一些，我一般是在周末或假日由一名秘书和两三名工作人员陪同，乘总统专用的波音 707 飞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程。飞机航行证件上说，这是为检查总统旅行航线而进行的一次定期训练飞行。它将在法国中部布尔日附近一个法国空军基地阿沃尔机场着陆。法国人在这个基地驻扎着幻影战斗机和 KC-135 加油飞机，外形同总统专用飞机差不多。我坐的飞机降落后只停很短的时间，让我在那里下飞机；它从雷达追踪电波中消失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五分钟；然后它就载着我的秘书飞往法兰克福的莱茵-美因机场。这时我的助手和我已转乘蓬皮杜总统专用的神秘-20 式喷气机飞向巴黎附近供私人飞机使用的库布莱镇机场。

在库布莱镇机场上，沃尔特斯将军登上飞机来接我，理所当然为自己的安排洋洋得意。^①他把我和我的同事领到一辆没有标志的租来的雪铁龙牌小轿车上——这对沃尔特斯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他是正式派驻巴黎使馆的人员，而这次旅行不能告诉使馆，开始的时候又没有官方拨款可以偿还他支付的费用。他开车把我们送往巴黎纳伊区他居住的那幢公寓楼，途中通常都要提醒我这件事。到达后，他就偷偷用电梯把我们从地下车库送到他住的一套房间。他的管家只知道我是前来访问的一位美国将军，名叫哈罗德·A·基尔希曼。我们在那儿过夜（他把自己的卧室借给了我）。第二天沃尔特斯开车把我们送往巴黎郊外舒瓦齐勒罗瓦区达迪路十一号。这里距离我们住处有三十分钟路程，是一个中下阶层居住区。有一年半时间，秘密会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 从上下文看，应为二十一日。——译注

在三次旅行中，两次都是按这种程序顺利进行的。但是三月十六日的会晤却由于飞往巴黎途中发生技术故障险些儿流产。驾驶员突然发现起落架液压控制系统失灵，必须用手操作才能使它降落。然而降落后如果不补充制动液就无法使起落架重新升起。在阿沃尔机场着陆是不可能了，因为驾驶员不了解法国军事基地是否有设备进行这种虽然次要但却必需的修理；即使有这种设备，也会由于一架进行训练飞行的总统专机从一切追踪雷达上消失过久而引起疑问。

飞机必须飞往德国的莱茵-美因机场，而那儿谁也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更不知道我们的使命和困境。我的旅行并没有通知国务院的官僚机构，因此无法告诉德国当局有一架法国飞机要来接我。

幸好总统专机都配有优越的通信设备。我当时的特别助理托尼·莱克通过华盛顿线路中转，从飞机上同巴黎的沃尔特斯将军取得了联系。沃尔特斯前往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交涉，由当时担任法国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的米歇尔·若贝尔和蓬皮杜总统亲自授权派法国总统专机去接我——这次是在法兰克福。

我在莱茵-美因机场一个黑暗的角落着陆；蓬皮杜专用的喷气机已在那里等候。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沃尔特斯是用什么借口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地方搞到一架波音707飞机用的舷梯。我的工作和我迅速换了飞机，着陆不到十分钟就又起飞了。沃尔特斯自称，西德人之所以迅速合作是因为他们——在他的糊弄下——相信飞机上的乘客是蓬皮杜的秘密的女朋友。^②沃尔特斯戏剧化的禀赋曾经办成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不过我常常纳闷，他怎么会认为乘客的性别可以瞒得过在那里等候的地勤人员。

不管怎样，沃尔特斯以他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使我们三月十六日的旅行化险为夷。他一切出色的成就都具有这种特征。结果我们又欠了若贝尔和蓬皮杜一笔债。后来若贝尔担任外交部长时，他同我经常要交锋，但是在越南谈判期间，他从来都是很帮忙而且慎重其事的。至

于蓬皮杜，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们的信任，没有因为了解我们的秘密而试图得到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要求我们对他采取的大量友好行动做任何报答。

我们在舒瓦齐勒罗瓦同北越人会晤用的那幢房屋可能属于当地工厂的一个领班。底层有一间小起居室，旁边是一间更小的餐厅，通向花园。起居室内面对面摆着两排绷着厚实的红套垫的安乐椅。美国谈判小组——我、我的越南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瑟尔、托尼·莱克以及沃尔特斯将军——沿着门左边那面墙就座，北越代表团共六人，坐在对面，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四五英尺，但观点上的距离是无限的。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春水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起居室，去会见作为当权的政治局成员地位比春水高好几级，但却宁愿使用春水的特别顾问这个头衔的人。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第一轮谈判

黎德寿头发花白，仪表端庄，总是穿一套黑色或褐色毛式制服。他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只是偶然才显露出使他十六岁就参加共产党抗法游击队的那种狂热。他一直神态自若，除一两次外，举止态度都无懈可击。他总是胸有成竹，并且竭诚而巧妙地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他的目标是要摧毁美国的意志，并在我们力图保卫的一个国家里建立河内的统治。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建立了有限的个人接触，私下开玩笑的时候多了，了解到黎德寿以革命为职业，他的专业就是游击战争。他可以口若悬河地高谈和平，但就他个人的经历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陌生而抽象的概念。他在法国统治时期蹲了十年监狱。一九七三年，他领我参观河内一座历史博物馆，忸怩地承认他过去从没有来过。那些越南历史文物——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都是法国殖民政府搜集的——使黎德寿想到出土这些文物的城镇里的监狱，而不

是想到越南文化的光辉灿烂。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陈列室，期间我获得大量关于各种牢狱中单独监禁的相对优点，关于警察如何识破伪装的农民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我若是决定在印度支那领导一场游击斗争，这些知识是极为宝贵的。

对列宁主义戒律的热烈信仰和对越南民族的信心支持黎德寿以惊人的英勇进行活动，把极端自信转化为一种信念，即越南注定不仅要统治印度支那，而且要统治整个东南亚。他的民族优越感使个人对美国的憎恨都无足挂齿了；我们不过是几百年来由于天生愚昧无知而撞入印度支那的又一批洋鬼子，而越南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洋鬼子赶出去（当然，我常常想，还要先把他们折磨一番）。

黎德寿的列宁主义使他深信他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的动机。他的越南传统表现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唯恐上当的情绪。我有时怀疑，表面上的斗智失败可能比实际失败更使他烦恼。四年后，谈判终于严肃起来，这时他却要在我们提出的最无害的建议中寻找陷阱。开始时，抱着这种心态的他大讲特讲任何资本主义诡计都骗不过他。后来，这种说教让人越听越厌烦。

我逐渐明白，黎德寿把谈判看作是另一种战斗。按照他的定义，任何妨碍河内取得最后胜利的解决办法都是一种诡计。他来就是为了把我拖垮。作为真理的代表，他根本没有妥协的概念。河内的建议是唯一“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谈判基础。北越人是“被压迫的民族”；尽管历史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他仍认为北越人根本不可能压迫别人。引起战争的全部责任都在美国。我们建议通过战争降级或停火来减少敌对行为——这在批评我们的人当中是非常时髦的——而黎德寿认为这是阴谋诡计或制造混乱的机会。照他看来，结束战斗的唯一“合理”办法是美国接受河内的条件，即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撤退并推翻南越政府。作为“真理”的代言人，黎德寿根本不理解我们的谈判方法。用让步换取让步对他来说似乎是不道德的；除非出现比道德更高的需要，否则他准备无限期等待，直到我们不愿继续为止。他关心的似乎是

使自己在越南斗争伟人祠中得到有利地位；他无法平等看待我这样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把雄辩看成是扭转历史不可抗拒的进程的一种手段的野蛮人。黎德寿无疑是一个做英雄的料。我们很不情愿地理解到——而国内许多人始终不理解——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具有偏执狂般的决心。他们中很少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人；他们顽固得近乎疯狂；他们并不擅长通过谈判取得和平。

我们在达迪路那间昏暗的起居室里第一次见面时，幸好我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否则我可能早就不干了，最低限度我会把自己由于希望这次会晤成为和平对话开端而产生的期待感——几乎是欢欣鼓舞的感情——克制一下。

黎德寿同我见面时表现冷淡而彬彬有礼，就像一个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性，因此即使表示一种近乎纡尊降贵的礼貌也不会有失身份的人那样。我讲笑话他也笑，有时放声大笑，有时则像重任在身而又被琐事耽误的人那样不耐烦地笑。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经过十年囹圄和二十年战斗生涯，他不会倾倒在一个资本家幻想的魅力面前。二月二十一日会谈分两次进行。上午谈了三小时，后来休会，使沃尔特斯将军和我可以到圣路易岛蓬皮杜总统寓所去同他共进午餐，并讨论前面提到过的他即将访问美国的问题。午后较晚才恢复谈判。我那些来自河内的对话者连最细微的程序问题也不放过，直到我马上就要出发去看蓬皮杜的时候才同意下午开会。这正是他们的特点。

我过去在学术界的同事认为，河内不相信我们的意图是通过妥协取得和平的主要障碍。我对这一点仍然半信半疑。上午开始会谈时，我宣读了一篇事前准备的讲稿，保证我们一定认真谈判。我强调说，我们希望达成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过去一切协议只是使无休止的战争暂时停顿下来，我们不想重蹈覆辙。我指出，从八月份我同春水举行会晤以来，河内的处境并没有改善，而尼克松总统已经证明是得到公众支持的；按照当地的力量对比，河内也没有理由坚持在政治上得到支配地